

穆斯林兄弟会与埃及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徐姗姗， 张 维

(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2)

摘 要:埃及政党政治经历了宪政时代、纳赛尔时代和后纳赛尔时代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埃及经历了多党政治、一党政治和政党政治多元化的变化,这充分体现了埃及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穆斯林兄弟会在这三个时期中经历了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对埃及政治民主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关键词: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政治民主化

中图分类号:K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66(2011)02-0100-05

通常认为世俗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在中东地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伊斯兰教在诸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是在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某种程度上却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现代化在政治层面的核心内容是政治民主化,具体体现为政党政治和民众的政治参与。埃及的政党政治演变经历了宪政时代、纳赛尔时代和后纳赛尔时代三个时期,穆斯林兄弟会在这三个时期经历了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本文就穆斯林兄弟会的建立及其在这三个时期对埃及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影响作一浅要分析。

一、穆斯林兄弟会的建立及其性质

1928 年 3 月,伊斯兰教苏菲派思想家哈桑·班纳(1906~1949)在伊斯梅利亚城创建穆斯林兄弟会。初名为“班纳运动”,后改名为“穆斯林兄弟会”,意为坚持伊斯兰原旨教义,为实现伊斯兰使命而奋斗的兄弟。建立初期穆斯林兄弟会仅是一个松散的群众组织,后来发展成为有重大影响力

的宗教政治组织。总训导师哈桑·班纳声称穆斯林兄弟会并非政党,而是代表埃及民众的精神和灵魂,强调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教性。然而穆斯林兄弟会已经具备了现代政党的基本要素:明确的政治纲领、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广泛的社会基础。穆斯林兄弟会的基本政治纲领(即其宗旨):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最高指导原则,恢复伊斯兰教原旨教义,反对埃及社会世俗化和西方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渗透,消除伊斯兰国家的等级差别,实行伊斯兰教法,恢复哈里发制度,建立泛阿拉伯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兄弟会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兄弟会的领导人称“总指导”,最高行政领导机构为“指导局”,负责组织、宣传、教育等工作。设有“创建委员会”,是协商机构,其成员为兄弟会的元老。还建有军事性质的“秘密机构”,对其成员进行军事训练。穆斯林兄弟会具有广泛的民众性:兄弟会的成员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由政府职员、大学生、军人、工人、农民、商人等社会各阶层的人员组成。

穆斯林兄弟会的建立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

收稿日期:2010-10-21
作者简介:徐姗姗(1986-),女,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史。

实原因。“埃及是自 641 年阿拉伯帝国占领后,逐步通过伊斯兰化而成为伊斯兰国家的,从此伊斯兰的统治在埃及落地生根。”^[1]可见埃及具有深厚的伊斯兰传统,深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这是穆斯林兄弟会宗教理论的历史文化渊源。埃及处在欧洲、亚洲、非洲三洲的焦点,所在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所受到的来自西方的冲击与影响要强于处于中东腹地的其它伊斯兰国家,这是穆斯林兄弟会建立的历史地理原因。

1882 年埃及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922 年英国宣布埃及为独立国家,保留在埃及的国防、外交、少数民族等问题上的处置权。埃及的殖民地处境激发了穆斯林民众的爱国热情和宗教感情,这也为穆斯林兄弟会建立原因之一。随着英国对埃及殖民统治的深化,西方的政治、思想、文化和法律制度引进埃及,推动了埃及的现代化,现代化不可避免会同埃及本土的深厚伊斯兰传统冲撞,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为穆斯林兄弟会的诞生提供了土壤。此外,穆斯林世界的有识之士为摆脱民族危亡命运,开始找寻伊斯兰社会的未来出路,出现了伊斯兰现代主义理论思潮,为穆斯林兄弟会的建立奠定了理论根基。

二、穆斯林兄弟会与埃及政治进程

埃及政党政治经历了宪政时代、纳赛尔时代和后纳赛尔时代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埃及经历了多党政治、一党政治和政党政治多元化的变化,这充分体现了埃及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一) 宪政时期

1923 年—1952 年是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宪政时期,穆斯林兄弟会就产生于这个时期。埃及政坛起主导作用的是世俗色彩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与精英政治,“宪法的制定和议会的建立无疑是宪政制度的重要外在形式,诸多议会政党通过议会选举的形式角逐国家统治权力则是宪政制度的明显特征。”^{[2][3]} 宪政制度起源于埃及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召开的代表会议,其后又颁布宪法,成立内阁,开始尝试建立一种西方的政治制度。1908 年现代政党组织在埃及始露端倪,祖国党、民族党和立宪改革党相继组建,开启埃及政党政治。

宪政时代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根基的传统农业是经济基础,地主阶级掌握政权,王室是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埃及实际上处在王室、以华夫脱党为

代表的议会政党和英国殖民当局的统治之下。“诸多议会政党建立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之上,具有精英政治的浓厚色彩。地主与农民之间的深刻对立,决定了诸多议会政党之排斥下层民众政治参与的保守倾向。”^{[2][3]} 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往往兼有地主双重身份,与传统经济的密切联系决定了他们所代表的议会政党的保守性。宪政时代的政治制度本质上是借助现代政治模式,固守传统统治秩序。政党政治是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工具,民众参与微乎其微。

英埃同盟条约签订后,埃及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华夫脱党由于内部腐败和不能适应这种变化急剧衰落。与此同时,民众政治悄然崛起,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的影响迅速扩大。作为埃及、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第一个和影响最为广泛的原教旨主义派别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在初创时期仅仅是一个温和的世俗穆斯林的宗教协会,主要致力于和平的宣教和组织发展工作。以 1938 年为分水岭,1938 年以后,穆斯林兄弟会开始向暴力政治运动演变,直接卷入了王室、华夫脱党和英国殖民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其活动空间从宗教领域扩大到了政治领域。

穆斯林兄弟会是以埃及广大穆斯林民众为社会基础建立的,与建立在地主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之上的华夫脱党相比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更能推动下层民众的政治参与,扩大下层民众的政治基础。穆斯林兄弟会的参政议政以及所进行的一切旨在扩大埃及政治民主的活动,都是埃及政治民主化的表现。穆斯林兄弟会的活动主要通过和平方式和暴力方式进行。无论是采用和平方式的参政议政,还是采用暴力方式的暗杀行为,都体现了其代表穆斯林民众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反对王室封建专制和反对精英政治的历史进步性。

和平方式主要是指穆斯林兄弟会发起和组织的民众示威和其他政治活动,以及通过发行报刊和出版书籍来扩大在埃及社会的影响。“进入 40 年代,穆斯林兄弟会成为埃及最具影响力的民间宗教政治组织和非议会政党,拥有 2000 个分支机构和 50 万成员”^[3]。同时穆斯林兄弟会还利用了王室、华夫脱党和英国殖民势力之间的矛盾介入政治角逐,以实现自己的要求,壮大自己的势力,并在政治上争取更大的空间,积极对待战争问题,强调采用和平方式,又间接赞赏殉教行为。

暴力方式主要表现在穆斯林兄弟会建立“秘密机构”,发动政治暴力。“1945年—1948年间兄弟会采取了大量的政治暴力行动。华夫脱党及在埃及的外国势力成为打击目标。1947年曾于一周内四次袭击英军,而1947年—1948年发生了一系列针对犹太人财产的暴力事件。诺格拉西政府直至在开罗莫干山和伊斯梅尔发现兄弟会的军火库后,才认识到兄弟会的危险性,于是进行严厉打击,并查封其报刊《穆斯林兄弟会》,1948年12月8日下令解散兄弟会。”^[47]这是历史上兄弟会首次遭到执政当局的取缔。它与王室、华夫脱党的对抗,集中体现了埃及社会民众政治与精英政治的深刻对立,它借助宗教政治的外在形式,强调民众的参与性,与精英政治形成鲜明对比。

宪政时期是民族主义崛起的时期,世俗民族主义与宗教民族主义作为两股政治力量都致力于埃及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民族主义是伊斯兰世界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桥梁。埃及的伊斯兰传统根深蒂固,世俗色彩的政党政治又具有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在埃及这样一个伊斯兰国家,宗教是民众参与政治的仅存空间。穆斯林兄弟会正是借助了宗教组织,来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挑战世俗国家权威,从而调和了伊斯兰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冲突,推动埃及政治民主化进程。1952年穆斯林兄弟会与同样反帝反殖的世俗民族主义代表—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合作,合力推翻了法鲁克王室,掀开了埃及历史新的一页。埃及从宪政时期的多党政治过渡到了纳赛尔时期的一党政治。

(二)纳赛尔时期

1952年—1970年是纳赛尔统治时期,政治体制的一党专政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殖民统治的延续和民族矛盾的尖锐,促使民族主义在埃及兴起。宪政时期的政治危机、政党政治同民间政治的对抗为自由军官组织的崛起提供了土壤。1952年,兄弟会支持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企图借此对付华夫脱党和争取参政。但代表世俗民族主义的纳赛尔政权和代表伊斯兰主义的兄弟会在政治目标上存在根本分歧。兄弟会希望恢复传统的伊斯兰社会,纳赛尔在意识形态上奉行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世俗的政治观念与神权的政治观念必然发生冲突。“七月革命”之后,纳赛尔政权取缔包括华夫托党在内的议会政党,解散穆斯林兄弟会。

1952年纳赛尔“自由军官革命”后,埃及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民族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与集权主义的三位一体构成了纳赛尔时期埃及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模式。”^{[21]34}政治上—党专制取代了多党政治,通常情况下从民主化进程的角度考虑,极权政治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但是,在伊斯兰世界极权政治是诸多新兴世俗民族国家迈向民主不可或缺的一步。极权政治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现代社会模式的必经阶段,埃及政党政治的这种发展趋势,是用强有力的政权打破旧模式。从长远看,纳赛尔时期的一党专制与政治民主化不违背,这恰恰是埃及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前奏。

纳赛尔时代,埃及政党政治的突出特征在于总统集权、一党专政。纳赛尔作为总统,高居国家权力的顶点,凌驾于社会之上是埃及民众心目中“仁慈的君主”。“纳赛尔总统成为埃及新的政治秩序的中枢,控制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54]25}。议会名为最高立法机构,却缺乏独立政治地位,依附于总统,其决议只是一纸空文。“内阁成员仅仅充当听众的角色,只有纳赛尔是发言人”^{[61]3}。纳赛尔排斥其他任何政党,建立了解放大会、民族联盟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相继作为唯一合法政党存在。通过控制它们的成员入会资格,排斥其他政党参政的渠道,服务于纳赛尔政权排斥异己、驾驭社会和控制民众的政治需要。

“在纳赛尔执政后,埃及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现代化政策和措施遭到了兄弟会的反对:在纳赛尔实行的土地改革中,兄弟会坚决反对纳赛尔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土改政策;在组织新政府时,纳赛尔一方面想控制兄弟会要它参加内阁,但又在名额上进行了严格限制,导致兄弟会与自由军官组织公开决裂”^{[72]4}。”1954年10月26日兄弟会暗杀纳赛尔,纳赛尔借机开始了铲除兄弟会的计划。这是兄弟会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即从具有相当群众基础且对革命政权构成一定威胁的政治集团变成遭到当局铁拳镇压而七零八落的非法组织。1965年纳赛尔政权第二次大规模逮捕、审判和监禁兄弟会成员,这是纳赛尔时代兄弟会第二次遭到镇压。统治模式决定反抗模式,穆斯林兄弟会极端反纳赛尔的政治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埃及民众对专制政治的强烈不满及对民主政治的热切期盼。

兄弟会虽然遭到了打击并被解散,但它的“顽

强精神和持久战斗力,远远超过纳赛尔的估计。在埃及这样的一个伊斯兰国家,伊斯兰就是大多数人所崇拜的信仰,任何追求伊斯兰化的事业都比较容易获得人们的同情和支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绝不是镇压所能解决的问题。”^{[8]68} 纳赛尔的专制统治使得埃及的政治领域几乎无民主可言,不仅议会政党失去了参政的机会,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非议会政党也遭到了残酷镇压。国家与民众处于严重的对立之中,政治生活的社会基础极为脆弱,政治体制与穆斯林民众的政治要求严重脱节。60年代末,随着纳赛尔主义的失败,埃及人民从泛阿拉伯主义的幻灭中觉醒,从伊斯兰传统中寻找出路。标榜民族自尊、伊斯兰荣耀的兄弟会遂成为穆斯林的希望。

纳赛尔的统治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意义,它使埃及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取得了真正的主权国家地位。特别是纳赛尔所推行的一系列现代化政策,推动了埃及历史进程,由一个地主阶级或半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阶级掌权的半殖民地国家进入到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官僚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工业化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埃及社会结构的重组。纳赛尔时代是埃及历史迈向现代化所必经的阶段,只有专制政权的统治才能使埃及这个伊斯兰文化深厚的国家快速接受现代化,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也只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存在才能组织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埃及的现代化建设,经过纳赛尔时期的一党专制在萨达特时期埃及社会很快又恢复了多党制。

(三)后纳赛尔时期

70年代至今是后纳赛尔时期,埃及政坛开始了多党制,政治生活呈多元化。政党政治、选举政治和议会政治成为各种新兴势力角逐统治权力的途径。埃及从国家资本主义时期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旧有官僚资产阶级势力犹存,新兴社会阶级尚未确立主导地位,新旧社会势力处于重新组合的状态。这一时期的政党可分为执政党、官方反对党和民间反对党,三者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作为执政党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阿拉伯社会主义党、民族民主党始终推行自上而下的运作机制,政党内部缺乏必要的民主。萨达特的多党制政党政治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求生战略,它激活了统治集团内部受到压制和排挤的政治势力,允许他们在一定范围内展开活动,以图在这种自相矛盾的力量冲突中,确保对权力的控制。

萨达特执政后,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宗教政治组织重新崛起。一方面因为萨达特上台初期为了抗衡萨布里集团和左翼势力等反对派,鼓励拉拢伊斯兰势力,对穆斯林兄弟会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另一方面“萨达特执政以来的改革开放和自由化政策虽然使埃及经济状况有好转,但萨达特政权的性质决定了改革政策的真正受益者是他的至亲好友、官僚和权贵等阶层的人。”^{[9]432} 西方腐朽文化与价值观传入埃及,引起普通百姓对社会上充斥的西方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愤恨,这一形势有利于穆斯林兄弟会争取更多的民众支持。最后,政府的施政政策也起了推动作用。埃及当局采取支持宗教发展的政策以安抚民心,它在电视、电台播放宗教节目,诵读经文;报刊杂志增加了宗教文章,并大量出版宗教读物,这在无形中鼓舞了人民的宗教热忱。

1976年萨达特恢复多党制,兄弟会温和派借机参政,但兄弟会仍未取得合法地位,不能以政党资格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萨达特与兄弟会的合作乃是互有需求的形势所迫,因而是暂时的,政策性的,而分歧是根本性的,冲突是必然的。兄弟会对萨达特的重大政策,或持怀疑态度,或猛烈抨击。对于萨达特的多党制民主,兄弟会认为只是掩盖专制集权的遮羞布,至多只是半心半意而已。兄弟会强烈要求扩大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包括组建宗教政党的权利。”^{[10]42} 尽管如此,兄弟会也得到了恢复发展。“在这一时期兄弟会通常通过清真寺、伊斯兰俱乐部等阵地宣传伊斯兰教义,反对萨达特的内外政策,同时在工人、农民、商人、手工业者、中产阶级、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广泛发展会员。截止1981年9月,在全国已建立1500个分会,估计会员人数达20多万,支持者有200多万。”^[11]

这一时期是兄弟会的恢复与调整时期,兄弟会在不放弃其战略目标的前提下,进行策略调整,基本上放弃了暴力政策,树立和宣扬了兄弟会的和平形象,充分利用比较宽松有利的环境,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力量,向市民社会渗透,为下一时期兄弟会的演进和发展奠定基础。无论是纳赛尔的一党制政党制度还是萨达特的多党制政党制度都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政党制度,其本质是一致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决定了民众处在政治舞台的边缘,萨达特执政后期政党多元化进入了多党并存和一党独大。

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政坛上宗教政党与世俗政党对立。穆巴拉克执政初期一改萨达特晚期对兄弟会的镇压政策,实行政治解禁,恢复了民主化进程,继续推行多党制。兄弟会利用穆巴拉克政府推行的宽松政策,在第三代总训导师欧麦尔·泰勒迈萨尼的领导下采取以温和的改革主义为方向的政治路线,从事有节制的合法政治斗争。兄弟会“不再被视为由异化的、处于社会边缘的激进分子所组成的极端组织,而成为埃及社会主流伊斯兰教的一部分”^{[12]599}。

兄弟会在穆巴拉克时代的非暴力战略在政治上的第一个表现上是兄弟会成员以个人身份积极参加议会选举。“2000年人民议会选举,兄弟会获得了17个议席,第三次进入议会,成为人民议会内仅次于执政党民族民主党的第二大政治力量和最大的反对党派势力,对当局和其他反对党派均构成较大的压力。其他所有反对党派仅获得16个议席,而在独立人士加入民族民主党之前,该党只获得175个议席,仅占议席总数的39%!”^[13]第二个表现是稳步的向市民社会渗透,尤其是对同业公会进行控制。著名学者萨阿德丁·易卜拉欣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埃及的同业公会比政党更为关键,因为正如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一样,埃及的政党仍处于‘欠发展状态’。在过去的10年中,兄弟会及其伊斯兰同情者向同业公会的渗透,比在人民议会选举中的表现更好。”^{[10]58}迄今为止,兄弟会已经控制埃及医学会、大学教授协会和工程协会等一些有影响的同业公会。

从萨达特时代开始穆斯林兄弟会就利用政

党政治、选举政治和议会政治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争取更多的民众参政议政的权利。穆巴拉克政府不允许任何伊斯兰组织参加政治活动,之所以允许兄弟会成员以个人身份进入议会,是为了推行政教分离政策,兄弟会实际上仍为半合法的宗教社团组织。当局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态度仍然是压制,不同的是态度更灵活,力图将它纳入现代政体下予以必要的疏导、利用和限制。穆斯林兄弟会利用政府的这种态度采取渐进伊斯兰社会化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避免为政府的镇压提供口实。它一再申明反对暴力恐怖活动,无意“另起炉灶”,推翻政府,只希望在现行多党民主制下参与国家的“政治进程”。其实质是为了拓宽政治活动领域,以扩大影响。

综上所述,从宪政时期经过纳赛尔时期到后纳赛尔时期,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同政府的对抗中逐渐壮大,从一个分散的群众组织到一个运用合法武器斗争的政治团体,已成为埃及反对党派中最具社会基础、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宗教政治组织,在埃及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穆斯林兄弟会的斗争策略,经历了从暴力对抗到运用和平、合法或半合法的温和方式进行斗争的转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穆斯林兄弟会依据环境所采取的斗争,推动了埃及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作为埃及民众的政治代表,其活动空间不断扩大,活动方式多样,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埃及社会现代化的进步。其关于建立更加公正的伊斯兰社会的主张,对当代社会的批判和揭露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参考文献:

- [1]杨鲁平. 埃及伊斯兰政治势力与政权的关系[J]. 西亚非洲, 1990(2).
- [2]哈全安. 埃及现代政党政治的演变[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4).
- [3]S.Botman, Egypt from Independent to Revolution 1919-1952[M].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11.
- [4]李佳,田宗会. 浅析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及其与政府的关系[J].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3).
- [5]P.J.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 ,Baltimore :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1.
- [6]D.Hupwood , Egypt.politics and society 1945-1984,Boston:Derek Hopwood,1985.
- [7]刘中民. 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当代埃及[J]. 西亚非洲, 2000(3).
- [8]陈嘉厚. 现代伊斯兰主义[M].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
- [9]杨灏城,江淳. 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 [10]萨阿德丁·易卜拉欣. 埃及、伊斯兰与民主[M]. (Saad Eddin Ibrahim,Egypt,Islam and Democracy), 开罗美国大学出版社, 1996年英文版, 42,58.
- [11]钟山.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产生发展[J]. 西亚非洲, 1982(1).
- [12]金宜久,吴云贵.伊斯兰与国际热点[M].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2.
- [13]兄弟会在埃及的政治前途[J]. 阿文版.2001, www. al-jazeera.Net.